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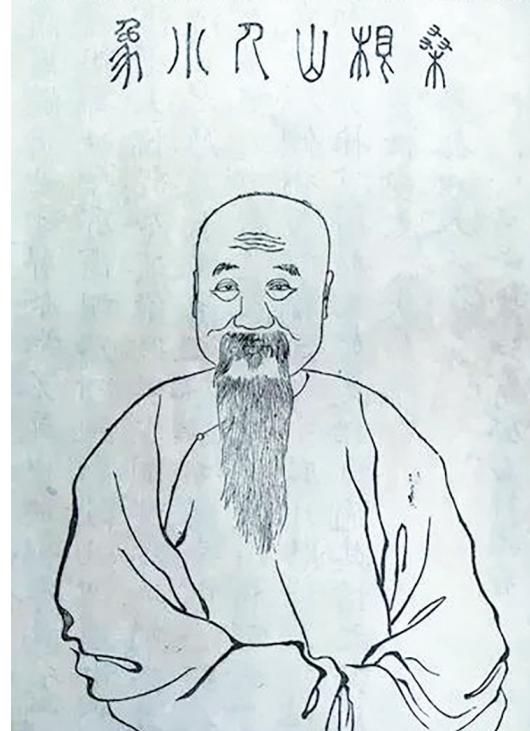
# 薛时雨、张謇和江谦

□薛来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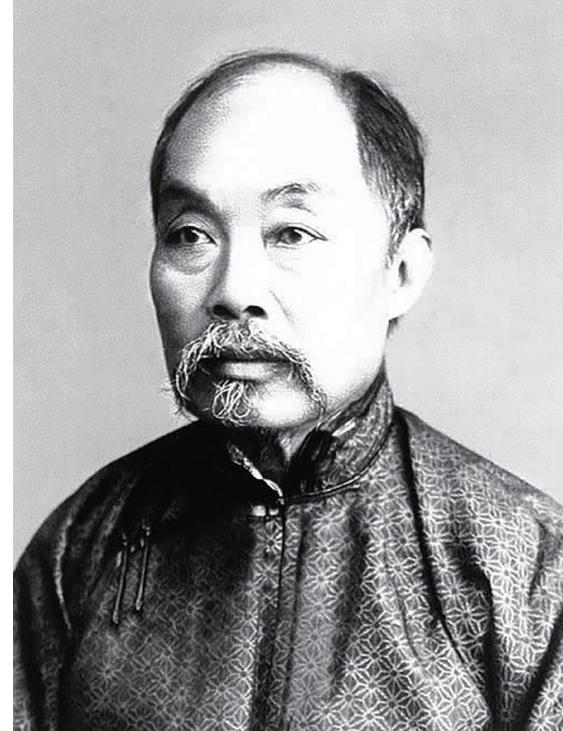
晚清状元、实业家、教育家张謇是薛时雨最得意的弟子。而张謇最得意的弟子就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(南京师范大学前身)的首任校长江谦。从薛时雨到张謇到江谦,一脉相承,提灯引路,薪火相传,滋兰树蕙,桃李芬芳。



历史人物



薛时雨画像



张謇照片



江谦照片

薛时雨是安徽全椒人,曾任杭州知府兼浙江粮储道,因看不惯清代封建官场的黑暗,愤而辞官从教,担任杭州崇文书院山长(院长)。后受两江总督马新贻的邀请,到南京担任尊经书院山长,同时掌教惜阴书院(两个书院都在惜阴书院办学)。南京惜阴书院位于清凉山麓、乌龙潭畔,由两江总督陶澍于1838年倡建。薛时雨充分利用这所书院的院舍希望多收些学子,让他们尽可能多的享受正规的教育。他主张“培养才宜宽,用才宜严”。用才者良枯不辨,或遗他日忧。”意思是:培养人才要放宽条件,多多益善;而使用人才一定要严格要求,分清优劣、好坏,如果分不清,必将对国家、社会贻害无穷。而且他认为“若夫培才,惟一志作‘养’,何自隘之?”就是培养人才,重在一个“养”字,就是千方百计培育、提升他的修养。因此他在崇文书院和惜阴书院掌教时,不论贫富、贵贱,只要愿意来学习的学生,他都收下,有教无类。清代著名的文史学家顾云曾经只是个喜欢舞枪弄棒的武夫,却被薛时雨收为弟子,最终成为一代名家。

薛时雨在惜阴书院掌教长达17年之久,视学生若子弟,“厚和旷远,不持仪节”,对待后进的学生,也能“极口奖借,尤能容异量之美”,尤其是对那些家境贫寒的学子,他都尽力给予帮助,关爱有

加。即使在病人膏肓之际,他也不忘出资帮助那些贫寒学子。他主张经世致用,因材施教,反对死读书、读死书,“不专诵章句”,而要求学生学习“明体达用之学”,认为举凡有益之学,兵农刑政、天地民物均可以学,这样学生即使不能成为名臣、良吏,也可以成为砥砺后学的纯儒。这样的教育理念,实已开近代先进教育理念之先河。在读书人普遍以科举为终极目标的晚清社会,他却认为科举“角艺如棋局外明,当场偶尔见输赢。名山可占千秋在,国士相期第一轻第”。劝慰学子们不要把科举考试太当回事,要努力成为真正有用的人,他的师长仁心可见一斑。由于他十分爱惜人才,并善于发现和培养人才,先后培育出晚清两名状元黄思永和张謇,一名探花冯煦,还有时称“石城七子”的江南才子顾云、秦泰唐、陈作霖、朱绍颐、何延庆、蒋师辙和邓嘉缜等人,江浙一带的文化名流大多出自他的门下。

同治十三年(1874年),张謇报考钟山书院被弃,便负气匿名报考了惜阴书院,被薛时雨以第一名录取。在惜阴书院,薛时雨不但对他学业悉心指导,而且在生活上给予极大的帮助。知道张謇家贫,薛时雨不仅免收他的学费,而且还免费安排他和儿子薛葆桢一起食宿。为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,张謇入住后,薛时雨

“又命仆于窗外种蕉”。张謇在惜阴书院住读3年,与薛时雨师生情谊深厚,真正是亦师亦友。光绪三年(1877年),张謇再次参加科举考试失败后,准备进入吴长庆幕府谋生,但又心有不甘。薛时雨知道后“招往询近状”,郑重提出“谋生急于读书”。17年后,张謇再次参加科举考试,高中状元,授翰林院修撰。

由于深受薛时雨的影响,张謇做官不长,便弃官从教、兴办实业。他一生先后任过赣榆选青书院、崇明瀛洲书院和江宁文正书院的山长;创办、联办、助办了370多所学校,“尽寸之智以附学究之本”,是南通大学、上海海洋大学、河海大学、上海海事大学、东华大学等学校的创始人。1893年,17岁的婺源人江谦拜于张謇门下,就读他任山长的崇明瀛洲书院,成为张謇最赏识与惜爱的学子。

张謇对江谦关爱有加,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,很好地传承了薛时雨“亦师亦友”的师生关系。张謇从亲身经历中,感受到了教育对培养人才的重要意义,因而对教育尤为重视,主张学以致用,避免急功近利地为了科举考试。在创办通州师范学校时,又提出“国家思想,实业知识,武备精神”三位一体的教育方针。1895年,他在张之洞力荐下掌教文正书院,首次在书院创建西学堂,增设英文、翻译、算学等课程,后来“拓宽至每次课题,分时

务、算学、兵、农、矿、化各学”。最终,文正书院于1901年转为现代教育的学堂。这与薛时雨要学习“明体达用之学”的教育理念一脉相承。

1915年,在张謇大力举荐下,江谦被任命为在两江师范基础上创办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(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)首任校长。在江谦的严谨治校下,不过三年多的时间,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为当时东南最高学府。江谦强调启发式教育,反对“我教你学,我讲你听”,主张“调整师生关系”,改变教师只管授业的状况,倡导关心、接近学生,尽导师的全责;同时要求学生尊敬老师,形成一种新型的“亦师亦友”的师生关系。他深受张謇的影响,提倡和重视“实科”教育,认为国家的富强,有赖于科学、实业,于是积极筹措增设了农业、工业、商业三个专修科,此举实开全国之先河。

从薛时雨到张謇到江谦,都强调学以致用,反对死读书,注重能力培养;提倡因材施教,重视师生交流互动,提倡视学生为子弟,亦师亦友,反对旧式的“师道尊严”,这也成为南京师范大学的“厚生”精神。了解了江谦,你就会发现,他与张謇、薛时雨在思想上、理念上、方法上乃至教育风格上都有惊人的相似。读懂了薛时雨,你也理解了张謇和江谦,这样的教育理念与培养学生的核素养一脉相承,这样的师生关系也堪称表率,启迪后人。

南通市通州区(原南通县)的干部群众,至今仍然深切缅怀80年前英勇献身的两名少年抗日英雄邢法和袁世晃。邢法,1927年生,家住桂莲乡团结村(今属东社镇),1941冬参加县政府科教领导的儿童工作队宣传抗日,后调《南通报》社任记者。袁世晃,1928年生,家住金沙镇东五里庙附近,1941年秋参加革命,后也调去报社工作。邢法的情况曾有耳闻,袁世晃则与我有着深厚的渊源。

我家原先也住在金沙镇东五里庙附近,和袁世晃家是隔壁近邻。年幼时袁世晃即给我的母亲做干儿子。他比我大一岁,我俩都是五里庙初级小学校长兼教师瞿树滋的学生。上学时,他像小哥哥带着小弟弟一样,每天同去同回,在学校、在路上经常照顾我。同在幼年,我不太用功,成绩一般。而袁世晃读书用功,成绩优秀,经常受到瞿老师的表扬。我的父母也很喜欢他,曾多次对我说:“袁世晃仅比你大一岁,要比你用功得多,懂事得多,你要好好向他学习!”听了父母的嘱咐,我以袁世晃为榜样,并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开始用功读书,成绩也逐渐好了起来。

1937年7月7日,卢沟桥事变,全面抗战爆发。瞿老师在学生中揭露日本侵略军的滔天罪行,宣讲团结起来抗日救国的道理,并教唱抗日歌曲。唱到最后,瞿老师举起拳头,领着同学们高呼口号: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!”“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抗日救国!”袁世晃的小拳头举得最高,声音最响亮。袁世晃就在这一年初小毕业,我也于第二年毕了业。

1938年3月17日,日军侵占南通城;12月下旬,日军侵占金沙镇,经常下乡骚扰。五里庙小学地处河口交通要道旁,瞿老师考虑到学生的安全,于1939年北迁2里多路,借用民房继续上课。而在原校址举办夜校,以教字学为名,宣传发动群众团结抗日,保家卫国。袁世晃和我积极动员家人和邻友去听课。

1940年10月黄桥决战胜利后,新四军东进。12月1日,成立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;1941年春重建中共南通县委。1941年7月瞿树滋被任命为金沙区抗日民主政府区长。五里庙小学毕业年龄较大的学生和当地青年农民,纷纷参加新四军和地方武装。9月16日,侵驻金沙镇伪二旅张圣伯一部伪军,窜到袁家近旁正欲强奸一良家妇女。袁世晃与父兄听到呼救,拿起大锹和刀具,立即赶去杀死伪军,救了这名妇女。随后袁世晃的父兄毅然投奔新四军,参加抗日。不久,袁世晃也投奔新四军,和恩师瞿树滋联系上,在区里担任文书和通讯联络工作。

我的胞兄庄凤林系南通县委会联络部驻金沙镇据点情报员,因叛徒出卖,于1942年2月9日被日伪军逮捕,受尽酷刑,坚贞不屈,于10日凌晨惨遭杀害。就在这一年的春末夏初,袁世晃来找我,给了我23元“法币”,说是瞿区长叫他带来的,要我交给寄父、寄娘(即干父、干娘)。他还问我:“想不想报仇?”我答:“想报仇。”又问我:“怎么报?”我答不出来。他开导说:“你要报的是家仇。现在不知道有多少家庭被日伪军毁了,家人被杀害了,这些家仇靠各家各户去报是报不了的。我国越来越多的领土被日寇侵占,沦陷区的同胞全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,要报的是国难家仇。”又说:“大家只有投靠共产党,参加新四军,拿起武器抗日救国,才能报仇雪恨!”他随即送我一本小册子,题目是《小六子的家》。我要好好看看。原来小六子一家被日伪军害得家破人亡,正是投靠共产党参加新四军,走上了抗日救国保家乡的道路。

临走,他叮嘱我:“你还小,平时要注意安全,想报国难家仇要藏在心里,千万不能流露。如有机会还是要好好读书,有了丰富的知识,将来可以投靠共产党,献身革命事业。”听了袁世晃的一席话,我感到这位小哥哥参加革命工作才半年多,已经成了很懂革命道理且具有高度警惕性的大哥哥。1942年的中秋节后,新四军派了一位同志推着独轮车,把我送到黄海边由抗日民主政府办的三余中学读书,一切费用全由新四军提供。

放假从学校回来,听说袁世晃已从区里调到《苏中报》社,当了小鬼通讯员。1943年4月,《南通报》创办不久,又听说袁世晃调到《南通报》社,担任了记者兼总务。县长梁灵光在反“清乡”斗争动员大会上,专门讲了报纸宣传群众、组织群众、武装群众的重要作用。县警卫团政治处主任韩念龙还提出:“我们共同努力开展竞赛,打击敌人‘战斗英雄用枪杆子,铁笔英雄用笔杆子,看谁对革命贡献大’”。袁世晃和同事们以笔杆子作刀枪,揭露日伪“清乡”的阴谋和滔天罪行,宣传发动广大群众组织起来,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,支持新四军和地方武装积极开展反“清乡”斗争;并不分日夜,不顾险阻,及时采写反“清乡”斗争胜利的消息和涌现的英雄模范人物及其事迹,以鼓舞党员、干部、广大群众和部队的斗志,更有力地打击和消灭敌人。

1943年4至9月,日伪军第一期“清乡”失败后,进行了三个月的延期“清乡”,未能得手,接着又开展“高度清乡”,派兵占领农村大小集镇,压缩我军民的活动范围,反“清乡”斗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。尽管如此,袁世晃以“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”的英雄气概,继续坚持反“清乡”斗争。1944年3月18日,他和同事邢法去骑岸镇东四里庙采访,再去地下交通站拿稿件和资料。当他俩走到四里庙时,遇到下乡“扫荡”的日军,不幸被捕。当晚,被押送到骑岸镇据点,三天后被押送到石港。在狱中,二人受尽种种酷刑,始终未向敌人透露半点秘密。4月24日,袁世晃和邢法被敌人押赴刑场时,大义凛然,一路高呼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“中国共产党万岁”等口号。附近群众含着热泪目送着两名少年英雄从容就义。就义时两人昂首挺胸拒不跪,被敌人在胸口连戳数十刀壮烈牺牲。当时,邢法年仅17岁,袁世晃年仅16岁。县委书记周一峰得知,痛惜而坚定地赞扬说:“十六七岁的青少年,有如此大无畏的革命精神,中华民族大有希望,中国大有希望!”县抗日民主政府还分别给两名烈士的家属颁发了褒章。

这两名少年英雄壮烈牺牲已有80年了,他们和我的胞兄庄凤林一样,一直激励着我延续红色基因,永远跟着共产党走。

## 征稿

“城市记忆”设有传家宝、老照片、史海回眸、地名掌故、老建筑、历史人物等栏目,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。来稿尽量图文结合。

投稿邮箱:csjy1000@163.com

## 我与张謇藏旧拓《怀素自叙帖》

□季真

先乡贤张謇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、教育家。张謇出生于海门常乐镇,与我的出生地张家镇仅八九里之遥。我作为一名文史工作者对张先贤甚为崇敬,我喜欢收藏,而十五年前,我收藏到被张謇生前誉为“丰城之剑”的旧拓《怀素自叙帖》尤为心仪的。

2008年4月21日,《海门日报》刊出了张謇藏旧拓《怀素自叙帖》重出江湖一文。文稿的作者邹仁岳是海门颇具声望的文史工作者,他在文中详细讲述了他童年的伙伴洪先生,在其家母去世24年后,将其母亲的陪嫁之物“几十张旧书稿”请他翻看。由此失踪近80年之久的张謇藏旧拓《怀素自叙帖》便浮出了水面。

我作为一个从事张謇研究20余年的文史爱好者,对此特别关注,我深知这本旧拓本的分量,因为即使是状元公张謇先生在当年能得到此物,也不是轻易易举的事。据考,怀素系唐代杰出书法家。其俗姓钱,字藏真,以僧名怀素行世。千百年来,怀素被誉为“草圣”,他的书法笔走龙蛇,匠心独具若行云流水,气势磅礴,为历朝历代的人们所重。由于历史的局限性,在印刷技术的古代,即使是其拓本也洛阳纸贵,难得芳容,而张謇藏旧拓《怀素自叙帖》不失为难得的藏品。

对于这部张謇藏旧拓《怀素自叙帖》的来历,在江苏古籍出版社于1994年10月所出版的《张謇全集》第五卷(艺文·上册)第278—279页(以下称94版《张謇全集》)及上海辞书出版社于2012年12月出版的《张謇全集》第六卷(以下称2012版《张謇全集》)第464页均有明确的记载。首先,在1920

年,张謇有“题怀素自序卷后”一稿。其内容如下:“草书于书谱外,唯有怀素自叙最奇纵有法,欲得之久矣。四五年前,扬州碑估以一本见示,颇似明拓而索值奇贵。不果得,尝以语人。顷德化唐翊之不慎于苏州觅得一不完之本,装成见惠。拓不甚旧,要为胜今。其缺者则开始之怀素云云以下至当代名公四十七字,中段之楷精详以下至师得亲承六十九字。二月有事扬州,晤方泽山君,君以所藏升元帖中残本见赠。中段之六十九字,居然获之。尚缺四十七字,丰城之剑,不知何时得合也。百冗之暇,偶一披览,正如与奇人怪士作世外谈,益人神智不少。”

上述文稿中的唐翊之即江南名士唐慎坊,其曾任苏州国学社社长等职。方泽山,名尔咸,泽山乃其字。伊乃江苏名士,解元公。升元帖的“升元”二字乃南唐年号,距今已是千年之久。保存至今,实属不易,难怪张謇当年视之为宝。其次,由于是残本,该帖尚缺47个字未能如愿。据目前发现的张謇于1925年所写的“题怀素自叙帖”补记中有云:“十四年乙丑,复从刘葱石借得文刻本,用钩写纸双钩前八行四十七字,以补是本之缺,释文亦补其半,以是本校刘所藏,苏、李二题独完。若建义文房印,刘拓有九而是仅五,多少不足异也。啬翁后题。为双钩者丹徒陈邦怀,为补释文者南通柯昌硕。”

关于这部《怀素自叙帖》旧拓的断代问题,张先贤在其文稿中即以方泽山所赠“升元帖”残本为凭据。张謇除了上述有:“君以所藏升元帖中残本见赠”外,在94版《张謇全集》第五卷(艺文·下册)及2012版《张謇全集》第七卷(诗词·联语),收录有张謇赋七律诗“题怀素自叙帖”,全诗如下:“南唐九重印文房,传到苏家补六行。赖是衡山留片石,涪翁

行,海门市张謇研究会在王皆欣的帮助下,将张謇藏旧拓《怀素自叙帖》影印后,作为会议资料分发给与会嘉宾。2009年12月21日,此件文物的拥有者王皆欣又因余之请,为了更好地研究、宣传弘扬张謇文化,而使我与张謇藏旧拓《怀素自叙帖》结缘。2011年7月,我经过认真调研和反复考量,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公开出版了《张謇藏旧拓怀素自叙帖》。

### 四

该书中还叙述了一段值得铭记的往事:1949年春,张慎仪之夫洪致远去台湾,张慎仪与年仅5岁的独生子洪俊驰则留在海门。张慎仪,洪俊驰母子过着小心翼翼,与世无争的生活。1970年春,张慎仪为心爱的儿子娶了媳妇黄士珍。1984年7月,旧拓《怀素自叙帖》的持有者张慎仪因高血压而突然与世长辞,从小在母亲含辛茹苦的庇护下长大的洪俊驰痛不欲生……在之后的岁月里,洪俊驰先后三次在母亲张慎仪的逝世纪念日将旧拓拿出,想将旧拓与其他的遗物一样化作乌有,三次都被妻子黄士珍阻止。黄士珍虽然与丈夫一样对旧拓《怀素自叙帖》如同天书一样茫然,但她总觉得将婆婆留下的东西保存下来,没有什么不好,她将张謇藏旧拓《怀素自叙帖》从丈夫洪俊驰的手中抢下:“家里难道连一本旧书都容不下吗?”可以说黄士珍是保护张謇藏旧拓《怀素自叙帖》的有功之臣。

遗风依旧吹古梦,千古文物共寂寥。这本历尽千年风霜,被张謇视之为“丰城之剑”“欲得之久矣”的宝物,在上世纪60年代又幸运地躲过了“破四旧”,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。目前,张謇藏旧拓《怀素自叙帖》及张謇对此文物的批注手稿等在我的保险柜中已度过了15个春秋。诚如张先贤所言:“偶一披览,正如与奇人怪士作世外谈,益人神智不少”。15年来,每当我翻阅此件文物时无不心潮澎湃:缘矣!张先贤。缘矣!张謇藏旧拓《怀素自叙帖》。